■ 往事回眸·红旗飘飘⑪

陆房战斗：八路军115师成功突围

□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戴玉亮
本报通讯员 宋杰

1938年9月，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，毛泽东提出“派兵去山东”。

115师主力挺进泰西

八路军115师师部、师直属队、343旅686团等组成东进支队，陈光任司令员，罗荣桓任政治委员。东进支队在115师代师长陈光、政委罗荣桓的率领下挺进山东。

从1938年底开始，日军增强驻山东的兵力，组建第12军，下辖第5、第21、第114师团、独立混成第5旅团、骑兵集团等部，占据着山东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，并开始向乡村渗透。

1939年3月，我东进支队由河南与河北交界地区进入山东，随后抵达东平无盐村。12日，在东平的夏谢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。罗荣桓指出，东进支队的任务就是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，依山(泰山)、傍湖(东平湖)向外发展。

1939年3月，东进支队智取汶上草桥伪据点，俘伪军一个中队。当时，115师以一部骑兵深入敌占区，侦察敌情。战士们身着日本军大衣，骑着缴获来的大洋马，伪装成日军来到草桥伪据点。115师骑兵连长叽里呱拉地讲着“东洋话”，命令伪军集合。伪军见“皇军”来到，急忙列队，我骑兵连趁机包围据点，并将伪军全部俘获。“草桥阅兵”的故事，后来在泰西群众中广为流传。而我军的这次智取行动，在当年刚创办不久的《大众日报》上也有报道。

1939年4月，东进支队在肥城阎王桥、东平香山、宁阳葛石店、泰安鱼池村等地连续打击日伪军，均获重大胜利，累计歼灭日伪军近千人，极大鼓舞了抗日干部和群众的热情，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。

日军九路围攻陆房

115师曾在平型关战役中重创日军，打败日本侵华精锐部队坂垣师团。自平型关大战之后，日军就四处寻觅我115师主力，并想方设法一举消灭。

听闻115师主力来到山东，日军又恨又喜。1939年5月初，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、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纠集两个旅的主力及济南、泰安、兖州、肥城、平阴、东阿、宁阳、长清等十几个城镇的日军共5000余人及伪军一部，配备汽车、装甲车100余辆，大炮100余门，分9路“扫荡”泰西地区，寻找115师主力决战。

从5月2日至8日，日伪军首先对大汶河南岸的东平、汶上地区进行“扫荡”，9日开始以“步步为营、稳扎稳打”的战术向肥城以南、汶河以北推进，逐步形成合围。10日，日军继续推进，紧缩合围圈。

1939年5月19日的《大众日报》曾经这样报道：“日寇自本月5日起，开始向我侧翼‘扫荡’，9日向我肥城山区进攻，一面修筑公路，逐步推进，紧缩我军占领地区……”

我115师除留下第686团两个营在原地坚持斗争外，师机关、直属队、津浦支队向大峰山区转移，山东纵队第6支队向平阴、东阿转移。但随着日军向中心推进，并控制山外各要口，形成封锁圈，115师师部、第686团、津浦支队、冀鲁边第7团、山东纵队第6支队等部和中共鲁西区党委、泰西地委等党政机关，共3000余人未及时转出外线，被包围于肥城东南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狭小区域内。这一地区，地形像一个脸盆，周围山势不高，无法隐蔽大部队。

陆房村地处济(南)兖(州)公路以西，三面环山，西邻大董庄；西南接肥猪山、岈山；北傍黄土岭、黑峪；东接凤凰山、蛤蟆山；东南面是开阔的小平地，115师师部就驻在陆房村附近。

5月10日，115师令686团在内线牵制敌人，其余部队分路向外转移。但行至途中，师部等均遭敌机动部队阻击，除6支队因道路熟悉转移出外，其余部队均转移未成。

陆房突围战打响

情况十分危急，115师当即决定，凭险据守，待机突围。

据张立华、董宝训所著《八路军史》(青岛出版社，2006年1月版)记载：

11日，日伪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发起全线进攻。我第686团沉着应战，指战员们用步枪、手榴弹、白刃格斗，打退日伪军的进攻。战至中午，日军改变战法，由轮番攻击改为集团冲锋。日军集中所有炮火，在山脚下向山上急速发射，直打得岩石开花、树枝横飞。第686团一直坚守着阵地。坚持在陆房以北、以东的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。师骑兵连奇袭陆房东北临安站之日军，给敌人以重创。战斗中，曾有200多名日军一度逼近115师师部驻地陆房村，八路军与其展开肉搏战，血战持续了一天，我军守住了阵地。

入夜后，日伪军畏怯夜战，实行收缩兵力、包围监视战术，企图次日再度进攻。为防我军夜间突围，日军以重兵把守陆房周围各个制高点与大小路口，并燃起了堆堆大火。

115师决定利用敌人不敢夜战的弱点，实施隐蔽突围，确定了突围的部署、方向。提出，一要轻装；二要弹药、电台、银元不能丢；三要妥善处理伤员。突围部队一律枪上刺刀，压满子弹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。突围中，“必须坚决服从命令，不得自由行动，不得发出响声和光亮。”

夜间10时许，我军开始收容部队，进行政治动员，整理组织，宣布纪律，紧急轻装，埋藏重要物资，安置伤员。分3路突围的队伍，在当地农民向导的带领下，紧张有序地进行突围。

为了迷惑敌人，津浦支队骑兵连派出9人，每3个人一组，飞马奔驰在敌阵地前，并一阵枪、一阵手榴弹地攻击，引诱敌人仓皇还击。686团1营派小股部队用火力袭击迷惑敌人，4连派兵力警戒常庄、油山庄两侧。

我突围部队以686团1营为前卫，掩护师部、团机关沿岈山的沟口小路，向西南越过敌人的封锁隘口，拂晓前跃过汶河，至东平县无盐村。686团辎重部队经上庄、郝家峪、白庙口、红山、刘庄、孙伯突围，拂晓过汶河到汶上城东。

5月12日上午，日伪军继续对我115师阵地发起猛攻，一直打到陆房村内，未见八路军一人。陆房一战，我军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，自己伤亡360余人，粉碎了日伪军围歼我115师的企图。

日军制造“狼山惨案”

115师成功突围后，失败的日军遂对狼山一带的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。5月12日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狼山惨案”。在狼山北，日军逼迫18名青壮年穿上八路军的服装，跪在地上，然后进行拍照，随即全部用刺刀捅死。山前刘家村桥下的8名无辜群众，被拉到桥上枪杀。从早晨到中午，日军杀害当地群众88人，烧毁房屋153间，其中仅刘家村就有36人被杀。山上山下烟火弥漫，哭声遍野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东陆房、西陆房、刘家村、大董庄、黑峪、牛庄、东界首、西界首、孟村、李村、赵村、下庄等15个村，被残杀的群众达126人，烧毁房屋无数。

2011年5月24日，本报记者来到肥城市安临站镇东陆房村采访时，见到了当年战斗和惨案的目击者、现年85岁的马宪振老人。当时只有13岁的马宪振，亲眼目睹了115师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场景。牙齿虽然掉光，但身板硬朗的马宪振说：“八路军的一个机枪手，左边一挺机关枪，右边一挺机关枪，轮着打。”(据我们分析，一个士兵不可能操作两挺机关枪，尤其那时机枪如此珍贵，可能是另一名机枪手牺牲了。)

八路军成功撤退后，日军杀害了不少东陆房村的百姓。马宪振说：“光我们村马家街一条街就有13人被日本人杀了。我父亲也被他们害了，那年他47岁。我当时和两个15岁的小伙伴躲在一条水沟里，因为狗叫被日本人发现。他们两个被抓去当八路军杀了，我个子太小，像个小孩，冒充不了八路，才没死。”

陆房战斗遗址

陆房战斗纪念碑 贾安东 摄影

·相关链接·

陆房战斗打开山东抗日局面

陆房战斗，是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末期，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初到山东后进行的第一次战役性的战斗，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。

陆房战斗，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日军，粉碎了日军合围的阴谋，而且保卫了我抗日武装的精华115师及当地党政机关、干部。

陆房战斗的胜利也赢得了我八路军主力进入山东的合法地位。时任抗战统帅的蒋介石为陆房战斗的胜利发出了“殊堪嘉慰”的贺电，事实上承认了我军主力进入山东的合法地位。因为当时115师进入山东，本属“先斩后奏”。

与此同时，陆房一战，为建立、巩固和扩大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刘伯承同志在《我们在太行山上》一文中指出：“1938年12月以后，115师东进。在冀鲁豫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。在1939年5月的陆房战斗中毙伤日寇1300余人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起来。”

陆房突围后，115师一面以游击战争方式打击日伪军，一面协助当地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政权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。在运西、泰西地区，争取了郓城保安副司令祝壁城部1500余人、鄄城保安队、汶上县长及其武装等参加了八路军，并争取了伪军侯宪明部4000余人反正。经郓城、东平、宁阳多次战斗后，基本上清除了当地伪军各个据点。我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固，运西、泰西两区连成一片，在津浦路以西、运河两侧、黄河以南的三角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。同时，115师主力部队得到了快速发展。1939年7月，扩编成115师独立旅，下辖2个团和1个补充团。

1939年8月1日，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，在山东地区正式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，徐向前任司令员，朱瑞任政治委员，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冀鲁边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。

陆房战斗的胜利，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，一举打开了泰西地区的抗日局面。1939年秋，泰西地区建立了专员公署，成为鲁西成立最早的行政专署。泰西行政委员会和专署的成立，是泰西抗日根据地形成的标志。随后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。具体到陆房战斗发生地的肥城，党的建设得到空前巩固与发展，县委机关逐步健全，各区都建立了区委，多数区还建立了数量不等的中心支部。仅三区即建立中心支部8个，村支部45个，有党员1000余人。县、区、村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区抗日武装，青救会、妇救会、农救会、工救会、儿童团、自卫队、教育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，也从县到村系统地发展了起来。

(戴玉亮 搜集整理)

贝叶古韵

刀砍水煮、铁笔刻写、金粉装饰，普通贝叶幻化为傣族文化“百科全书”。

但资源日益匮乏，技艺后继乏人，贝叶文化遗产岌岌可危。

□在云南的傣族聚居区，几乎每一个村寨都有佛寺佛塔。在这些佛寺里，保存着大量由贝叶记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经文，傣语称为“坦兰”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贝叶经”。

贝叶经不但记载了佛教经典，也囊括了傣族的天文历法、社会历史、法律法规、民情民俗、医理医药、文学艺术等丰富多彩的内容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傣族文化。因此傣族人民对贝叶经倍加珍惜，将其誉为“运载傣族历史文化的神舟”、傣族文化的“百科全书”。

1982年，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、唐国强与李秀明主演的傣族爱情故事片《孔雀公主》，便是由贝叶记录的傣文叙事长诗《召树屯》翻译改编而来的。

现在发现有贝叶经留存的国家，除了中国以外，还有印度、泰国、缅甸、老挝、斯里兰卡等国。据调查，云南西双版纳、思茅、临沧、德宏一带，除了发现傣文贝叶经以外，还有老挝文、缅甸文、泰国文贝叶经。

由于西双版纳的傣族与泰国的泰族、老挝的老族、缅甸的掸族具有相同的族源，与百越族群渊源极深，共同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，其居住地又山水相连，因此形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东南亚贝叶文化圈。

西双版纳州聚居着傣族、哈尼族等12个少数民族，这里的500多座佛寺，保存了5万多部贝叶经，是继承贝叶经制作技艺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。

在西双版纳发现的巴利文本和傣文本贝叶经，规格多为每页四行式、五行式、六行式和八行式四种。

以前，佛寺里的和尚与佛爷，必须要掌握制作贝叶经的技艺。然而近年来，由于受现代文明的影响，贝叶经的制作传承，已经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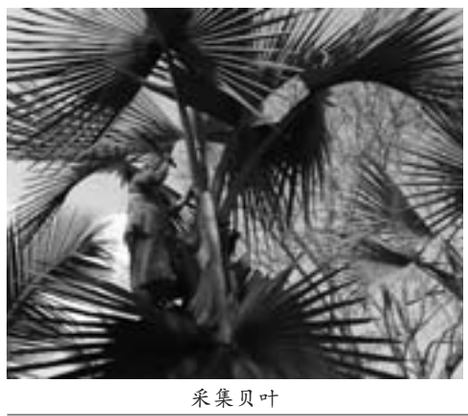
西双版纳州文化馆一直致力于整理、抢救傣族的贝叶经，馆长段其儒介绍：目前在西双版纳，能够熟练制作贝叶经的，仅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傣族老人。

□现年77岁的波温康郎叫，便是其中从事贝叶经制作时间较长、技艺颇为娴熟的一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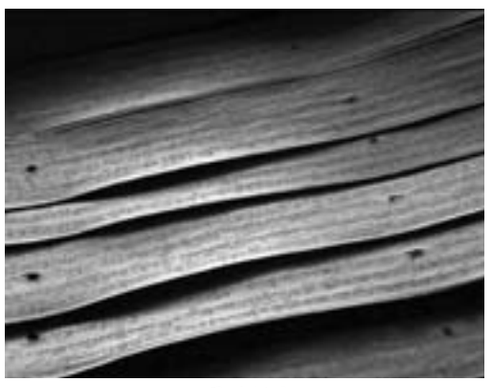
像其他傣族男性一样，康郎叫的姓氏为岩，乳名为“叫”——在傣语中是“珠宝”的意思。

12岁时，岩叫落发出家，进曼降佛寺当了和尚，学文念经，法号“帕叫”。由于他刻苦攻读傣文，精通佛学理论，备受住持法师长老的器重。于是，1955年，岩叫刚刚21岁时，便被晋升为“都”，也就是佛爷，法号“比叫”，并很快被提升为传授佛法的一位传法上师，制作贝叶经。

岩叫25岁时还俗成家，被冠以“康郎”，人们通常称其为“康郎叫”。此后，“康郎叫”在村子里务农，当过会计，也兼做过傣族草医，一直坚持制作贝叶经至今，目前已经四世同堂。


采集贝叶

刻写贝叶经


贝叶经文

据康郎叫介绍：制作贝叶经一般要经过取贝叶、制匣、刻写以及装帧四大工序，听上去似乎简单，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功夫活。

制作贝叶经的贝叶，采自贝多罗树——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其《酉阳杂俎·广动植物之三》中记载道：“贝多罗树出摩伽陀国，长六七丈，经冬不凋。”

只能生长在热带、亚热带地区的常绿树种贝多罗树，属于棕榈科木本植物，也叫贝叶棕。它的植株高大，躯干粗壮笔直，不分枝长杈，叶片呈掌状展开，形如蒲扇；长柄的贝叶在树顶聚合成半圆，形状恰似一把巨大的绿色雨伞。

位于热带湿润区的西双版纳，非常适宜贝叶棕生长。贝叶棕通常被栽培在佛寺庭院或者周边，傣族人称其为“戈兰”。

一个美丽的傣族传说，演绎了贝叶成为制作经书原材料的曲折历程。

传说，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傣族小伙子为了寻找光明，辞别了他的未婚妻赶往远方。

这对情侣约定，每天都要给对方写一封信，起初是把文字刻写在芭蕉叶上，由一只鹦鹉为他们传递。随着小伙子越走越远，芭蕉信的传递时间便越来越长。这样，芭蕉信尚未到达对方的手中，便已经枯萎了，致使字迹模糊不清，难以辨认。

有一天，这位傣族小伙子在森林里无意中发现：一种叫贝叶棕的叶片，由于昆虫啃食叶肉，留下了清晰的纹路。于是他突发灵感，将那些倾诉给未婚妻的情话，刻在了那种棕榈的叶片上。自此以后，这对情侣之间的贝叶情书，尽管经过长时间的传递，字迹却依然完好如初，清晰可见。于是，傣族百姓认为，是充满智慧的先民们，发明了用贝叶棕的叶片刻写文字的方法，因此贝叶也就象征着光明与爱情。

美丽的传说引人入胜，却难以成为探访贝叶经的可靠依据。

□段其儒介绍：据有关资料记载，贝叶经起源于印度，然后经过尼泊尔、斯里兰卡和泰国、老挝、缅甸传入中国。传入中国以后，首先传到西双版纳，然后又传到思茅，就是现在的普洱地区和宝山、临沧一带流传。

采集贝叶一般选择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，这期间，西双版纳等地尽管依然较为炎热，却是贝叶成熟到能够满足制作贝叶经所需的季节。

把精心挑选老熟的贝叶砍下来后，再根据制作经书文本的尺寸要求，对贝叶予以进一步筛选整理。

接下来，把捆扎好的贝叶一束束地放进盛有淘米水的锅里 ，再把一种叫做酸角的植物果实，扔进锅中与贝叶一起煎煮。

今天，在锅中加入酸角或淘米水煮贝叶的传统方法，不但被继续沿用，而且进行了更新——有些艺人还在锅里加入柠檬之类的酸性物质。这样做的主要目的，是让贝叶表皮易于脱落。一般要煮半天乃至24小时，直到贝叶由绿变黄，从硬变软，呈现出浅绿色，才可以从锅中捞出来。经过这样处理的贝叶，既能防虫、防水，又可以防腐蚀，不易变形，经久耐用。

因此，有些贝叶经，虽然被保存了近千年，却依然完好如新，便不难理解了。

煮好的贝叶并不能直接使用。段其儒介绍：贝叶经的加工工艺很复杂，贝叶煮好以后要进行打磨，把叶片上的绒毛去掉，去掉以后再晒干或者晾干，晾干以后要把它压平。

打磨好的贝叶，被压平顺之后，放在阴凉处晾干，收起来继续风干一段时间才能使用。

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，在那些成品的贝叶经上，普遍等距离地存在着两个圆孔，这两个圆孔并非无意间留下来的，而是暗藏着压平的玄机。

这便是制作贝叶经的第二道工序：制匣。压平使用的木片或者竹片，康郎叫等艺人将它们称为“木尺”。

康郎叫把一片片晒干压平，经过透风后的贝叶叠在一起，紧紧夹在特制的两片木尺中间，然后沿木匣两端的圆孔，用钉子将五百至六百片贝叶订为一匣。

接下来，康郎叫将装订好的贝叶，用刀沿着木匣边缘修裁光滑，使其每片大小基本相同。

然后，康郎叫又拿来了“墨线弓”——一种与木工使用的墨斗功能类似的工具，在修裁完毕、重新打开的贝叶上，依据贝叶宽窄，按照四行式、五行式或者六行式、八行式四种格式，把墨线轻轻弹在每一片贝叶上，就像在空白的纸张上，打上一些规整的格子，便于将文字写得更加工整有序。

至此，制作贝叶经的材料已经准备完毕。

□奇怪的是，书写贝叶经使用的既不是毛笔，也不是常见的钢笔、圆珠笔或铅笔，而是一支与毛笔长短相近的“木笔”，这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？

原来，将这种笔称为“木笔”并不准确，它的专用名称应该是“铁笔”。

事实上，傣族先民最早刻写贝叶经时，使用的并非铁笔而是尖刀。然而，在刻写过程中，尖刀捏起来极不顺手，并且刀的刃口过于宽大，刻写出来的文字难以规整。经过不断实践、反复改进之后，傣族先民便发明了铁笔。

铁笔的制作，一般要选择比较结实、能够防虫蛀，捏起来有一点手感的木材，过去以檀香木或樟脑木为上等材料。然后选择和手指差不多粗的木棍，把它削光滑以后，再把笔尖部位削成一个四方形的锥形，然后在中间打入一颗缝衣针，再在磨石上把它磨尖，这样就可以使用了。

在康郎叫刻写贝叶经的工具笸箩里，我们发现，除了铁笔，还摆放了磨石、镜子之类的东西。

磨石是用来磨笔用的，笔刻到一定的时候，锋口会钝了，所以需要用磨石来磨锋利，然后再用镜子磨一遍，保持锋口更好用。

刻写贝叶经，不但需要纯熟的技艺，还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毅力。

虽然康郎叫已经刻写贝叶经半个多世纪，称得上技术娴熟了，但是如果刻写一本10多页的贝叶经，也仍然需要耗费大概5到6天的功夫。

为了使刻写完成后的贝叶经，清晰地显现出文字，康郎叫还要对其进一步处理。

段其儒介绍：因为贝叶基本上是呈淡绿色的，显示不出刻写上去经文的内容和字迹，所以就用锅底灰，加上植物油调在一起，然后还要兑上一定的酒，因为加上酒容易挥发释放。把它们涂上去以后，再用抹布擦干，在字迹显示出来之前一般还要用细一点的河沙打磨光滑，这样完成以后，涂过锅底灰和植物油的贝叶经就清晰可见了。

接下来，才进入制作贝叶经的最后一道工序：装帧。

康郎叫把刻写好的贝叶装订成册，在贝叶的边沿，涂上一层金粉或者红漆、黑漆加以保护和装饰。

至此，贝叶经最终制作完毕。

贝叶经做工精细，规格统一，加上金粉和彩漆的装饰，给人一种精湛、古朴、大方、美观的感觉。经过水煮等特殊工艺处理后的贝叶经，能够保存几百年乃至上千年。

□在这一片片贝叶经的方寸之间，傣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，几乎都被记录下来。然而，在今天，随着时代进步与科技发展，以及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，制作傣文贝叶经的传统技艺受到了严重冲击。

在云南的西双版纳、思茅、临沧、德宏等地，除了那些和尚坚持刻写贝叶经以外，像康郎叫这样，还俗之后却依然致力于制作贝叶经的人，目前已经凤毛麟角。

针对贝叶经制作技艺面临的困境，云南省相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整理与抢救工作。

2008年，贝叶经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另一方面，尽管西双版纳等地的环境与气候，十分适宜贝叶棕生长，然而这些地方的贝叶棕资源，并非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，相反它们的数量正在日益减少。只有在一些佛寺及其周边，才依稀可见为数不多的成年贝叶棕树。

西双版纳等地的一些百姓，开始在苗圃里对贝叶棕进行人工育苗。然而，由于这些栽培的贝叶树苗，成活率只能达到20-30%，贝叶资源的接济，短期内依然是个极大的难题。

贝叶经制作技艺及其文化，是傣族人民宗教信仰、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古老见证，它已经不仅仅是傣族人民的，也不单纯属于中国的，而是全人类无法替代的珍贵文化遗产，如何有组织地整理、保护、抢救这一濒危的独特技艺与文化，将傣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明世代传承，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。

(中央电视台10套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供本报专稿)

探索·发现